

近年来，一些在欧美发展已不如意的“国际品牌”对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趋之若鹜。他们重塑自己，巧妙营销，以建立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奢华”形象。这其中，部分国外二线品牌摇身一变，化作“大牌奢侈品”，还有一些洋品牌，在本地大量闭店，难得一见，却在中国家喻户晓，受人追捧。



玛丽莲·梦露喜欢捷豹XK140MC 资料图片

# 没落欧美品牌在中国

## CK：擦边球与二线品牌

曾经，中国的“先锋”男青年从欧美时尚圈学来一种另类风潮——内裤外露。他们穿着松垮的低腰牛仔裤走在大街上，标识明显的内裤边缘总是时不时地“探出头”来。正是在这种“内衣外穿”的风潮中，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卡尔文·克莱 (Calvin Klein)。

很多人不知道，卡尔文·克莱依靠牛仔服装起家。时尚设计师卡尔文·克莱于二十世纪60年代在美国创立同名品牌，成立之初以极简、前卫的时装著称。

70年代末，卡尔文·克莱成功地起用了当时刚刚成年的玉女明星波姬·小丝拍摄广告。电视上，年轻的波姬·小丝甩动飘逸的秀发，一只手轻轻地搭在臀部，用磁性的嗓音说出了那句闻名全球的广告语：“我和卡尔文亲密无间”。当时，这支因为打性诱惑擦边球而饱受争议的广告曾让卡尔文·克莱品牌名声大涨。

但到了80年代，牛仔服装进入低迷期，卡尔文·克莱的发展也随之陷入低谷。公司于是将重心转移到内衣、香水以扭转颓势。2002年，卡尔文·克莱被PVH集团收购。

如今，在美国本土，卡尔文·克莱作为时尚品牌已不再受到大众的注目，销售则以内衣、香水和中价服饰为主。公司也改走“亲民”路线，主推二线品牌 (Calvin Klein Jeans)。然而，这个逐渐退出国际主流的品牌却在亚洲成功实现“第二春”。这其中，中国是卡尔文·克莱最大的亚洲市场，销售量占亚洲总额的七成。到2010年，卡尔文·克莱在华拥有超过300家专卖店。

## 珑骧：高级商场里的“国民包”

如果在法国街头做些观察，你一定会发现一种彩色饺子形的折叠包在视野中频繁出现。

十七八岁的少女们拿它当作书包或是逛街的随身包；上班族一手抓着报纸一手拎着它当公文包；抱着孩子的少妇肩背着塞满婴儿用品的大号包充当妈妈包；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则提着它去菜市场，拉链中还露出两根新鲜出炉的长棍面包。

这种彩色多样、形状酷似饺子的包具，就是法国经典品牌珑骧 (Longchamp)。珑骧折叠包的使用者跨越各个年龄段，曾被评选为法国人“最知名”与“最喜爱”的手袋，就普及程度而言，称它是法国的“国民包”一点也不为过。

既然是“国民包”，其价格自然“平易近人”。以最受欢迎的肩背式折叠包为例，按照尺寸大小的定价分别为55欧元、65欧元和75欧元。就法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来看，绝对称不上奢侈。材质上，“国民包”也绝对草根，它使用品质优秀但并不昂贵的尼龙和皮革。

珑骧品牌创立于1948年，一度在欧洲发展成畅销产品。但

如今，在与其他设计感更强的时尚品牌的竞争中，“饺子包”的发展已日渐平庸。据法国时尚杂志介绍，如今珑骧虽然仍在法国设厂，但规模很小，类似于样品设计实验室，只负责制作样包。而市面上人们所购买的“饺子包”，大多产于中国或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大约七八年前，山寨“饺子包”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流行。2008年，珑骧被正式引入中国高级商场的国际名品专柜。厂商还特别为中国客户重新定了价，经典款式中号“饺子包”基本款定价超过千元，虽不及路易威登、爱马仕，但也比其在欧洲的价位高出了三四成。而这种重新定位的“高端路线”，正好迎合了中国一线城市中具有一定购买力的白领阶层和赶时髦女青年的购物需求。

一些姑娘果断丢下原来的山寨包，换上了正品珑骧。也有人形成了“收集癖”。

## 捷豹：只受恋旧情结的赏识

如今，在上海最豪华的国际性酒店门口，时常出现捷豹的身影；北京东部的高档社区里，造型独特的捷豹在奔驰和宝马群中也一度成为亮点。对于不少中国男士来说，想要成为“绅士”，捷豹可能是最有效的“装点”。

在上个世纪的英国，只要人们谈论汽车，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说起捷豹。但如今，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被自己奉为高端的“英国豹”在欧美市场早已衰落。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捷豹就已随着威廉·里昂斯去世逐渐步入阴霾。其销售量每况愈下，最终在1989年被福特公司以40.7亿美元收购。

捷豹生产工艺的老旧和低生产率让福特大伤脑筋。2006年，捷豹平均每位工人每年只能生产16辆车。被福特收购的第三年，捷豹开始大幅裁员近三成。其推出的入门级X-Type轿车也以失败告终。2004年，仅一个季度，捷豹就导致福特豪车事业部亏损近1.78亿美元。到2005年，捷豹的品牌忠诚度已由前几年的85%剧降至38%。

在销售方面，以美国市场为例，1988年捷豹卖出了4.9万辆，1990年降至4.27万辆，转年下滑到2.56万辆，2007年的销量降到历史最低点——15683辆。

经过多年的痛苦煎熬，2008年，福特公司不得不将捷豹转卖于印度塔塔集团。面对欧美市场销量的持续衰落，如今捷豹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中、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

虽然捷豹这样的高排耗车型在中国不受鼓励，但这丝毫没能减弱配置2.2升柴油发动机的XF系列在中国的强劲需求。不少中国人陶醉于驾驶捷豹穿梭于大街小巷，如“甲壳虫”乐队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英国国宝级男歌手艾尔顿·约翰和美国女星玛丽莲·梦露一样，他们以拥有一辆捷豹为荣。

唯一的区别是，这些中国富人拥有捷豹的时间，晚了将近七

## 拉菲：西方不再热衷的天价酒

曾经，拉菲一度是欧美葡萄酒收藏家的宠儿，但现在，拉菲本身的品质与其被炒出的天价的不对称，已逐渐令收藏家们目瞪口呆，望而却步。在欧洲市场上，好年份的葡萄酒行情的确每年会有两到三次的上涨，但正常涨幅不会超过10%。而拉菲价格的急剧上涨，则令它失去了作为葡萄酒本身的收藏意义。毕竟，对于欧美藏家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葡萄酒的口感和品质本身。

欧洲人不再热衷拉菲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疲软导致奢侈性消费不济。然而，在中国，被欧洲收藏者摒弃的拉菲几乎成了一种地位与身份的象征。随之而来的，大量走私酒和假酒出现在中国市场上。据媒体揭露，一个拉菲红酒的空瓶子有时竟能卖到两三千元。

据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Lix-ex的调查跟踪，在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香港拉菲拍卖专场上，多个年份的拉菲成交价数倍于英国市场的交易价。

原《经济学人》杂志亚洲版主编吉迪恩·拉赫曼 (Gideon Rachman) 在专栏文章中提出了“拉菲的中国价格”(Lafite's China price) 以讽刺中国人的盲目炒酒。

## 派克：被抢购的过时之物

54岁生日之际，杭州的潘先生收到了一支价值一万六千余元的派克签字钢笔。这是他拥有的第9支派克笔了。潘先生对此颇为自豪：“有人收藏手提包，有些人收藏珠宝，而我收藏钢笔。”

不得不承认派克钢笔是一种奢侈品，不过，美国人乔治·派克在成立派克钢笔公司的时候，恐怕没料到钢笔能被卖到天价。

1888年，乔治·派克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简斯威尔创办了派克自来水笔公司。1899年，派克创造了易装易拔的笔套专利，第一支管套无缝钢笔问世。很快，派克笔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成为地位与身份的象征。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派克品牌开始拓展国际市场。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圆珠笔的问世，派克钢笔被打入冰冻期。1962年，派克公司获准成为英国皇室书写用具和墨水的独家供应商，派克钢笔成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御用笔。这件事被广为宣传并最终使派克一举成名。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电子化办公的普及，钢笔书写的命运日益黯淡。派克钢笔却对未来毫无惧色。因为在新兴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大批“品位优良”的消费者正带着复古情结狂热追捧着派克。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2009年，包括非奢侈品牌在内，钢笔在中国的销售额增至78亿元，比一年前增长了近17%。

《环球》

# “弄假成真”的几对革命夫妻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在白色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假扮成夫妻迷惑敌人。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产生感情后，经党组织批准，最后“弄假成真”变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

## 周文雍和陈铁军 把刑场当做结婚礼堂

周文雍，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

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后，周文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广州工人暴动。当时，在广州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扮成“新左派”，鼓吹民主、自由，借以笼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汪精卫的官邸“葵园”门前喊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敌人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周文雍受伤被捕。周文雍被捕后，党组织成立了营救小组，陈铁军和大家一起制定营救计划。周文雍被救出来后，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做地下工作。

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

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才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

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窗前照了相，作为结婚照。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两人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举行了悲壮的婚礼。

## 李白和裘慧英 办地下电台双双被捕

李白，1910年生于湖南浏阳，曾用名华初。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1937年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当时的电台领导人龚饮冰，把绸厂的青年女工裘慧英调到了李白身边，与他假扮夫妻，这样不致引起左邻右舍以及敌人的怀疑。

裘慧英，又名裘兰芬。1917年生于浙江省嵊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李白扮成假夫妻后，通宵达旦地收发电报，及时把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传达给上海地下党，又把日、伪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他们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1940年秋，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夫妻。

1942年9月中秋前的深夜，日本侵略军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中共地下电台，李白夫妇双双被捕。半个月后裘慧英获释。由于李白一口咬定是为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服务，帮朋友了解商业行情，而日军又未掌握实情，不知李白是为谁发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酷刑折磨的李白后经地下党营救获释。

日本投降后，李白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通过电台又把大量情报传送给党中央。1948年12月30日凌晨，遭国民党武装特务包围搜查，李白夫妇和孩子一起被捕。1949年5月7日，李白被秘密杀害，已出狱的裘慧英强忍巨大悲痛，继续为党工作。

## 彭咏梧和江竹筠 “江姐”接替丈夫的工作

彭咏梧，又名彭庆邦。1915年2月生于重庆。1937年秋，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就读时，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任中共云阳县委书记。1941年调到重庆，先后以大陆运输行业会计、中央信托局职员等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1943年，党组织派江竹筠同彭咏梧假扮夫妻，协助其工作。两年后，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结为夫妻，

后生下儿子彭云。1948年1月，彭咏梧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时年33岁。

江竹筠，1920年8月生于四川省自贡市，人们习惯称她“江姐”。彭咏梧牺牲后，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29岁。

## 任国桢和陈少敏 为了租房临时凑成对

任国桢，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晨报》编辑。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由济南转移到青岛，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

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但当时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尚未结婚的任国桢，自然没有眷属，房子也就租不成了。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

陈少敏当时在打蛋厂当工人，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但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调任国桢到中共北方局工作。陈少敏也一同前往，协助任国桢工作。

二人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相爱，经组织批准，成了真夫妻，并且生了一个女儿。1931年10月，任国桢以中共河北省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于11月13日被杀害，年仅33岁。

任国桢牺牲后，陈少敏非常悲痛。从此，她再也没有结过婚。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里。

## 王士光和王新 音信全无八年后重聚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四哥。

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1938年8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知道王光杰精通无线电技术，就将他从北平“招”到了天津，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

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假扮成夫妻。这位女党员就是王新。白天，化名吴厚和的王光杰在天洋商场其同学开办的一家电料行当技师，修理收音机。这样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容易搞到电台所需要的电信器材，而化名黄惠的王新则终日在“家”料理党的地下机关事务。在几个月的战斗中，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渐渐的，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

1939年8月，上级命令撤销秘密电台后，王新和王光杰一同离开天津，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不久，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夫妇之间失去了联系。1947年底，失去音信长达八年的王新和王光杰才重新相逢。王新在组织的安排下，穿过一道道封锁线，越过几个解放区，终于回到了丈夫身边。

潘丽华《党史博览》